《学术界》(月刊)
总第283期,2021.12
ACADEMICS
No.12 Dec. 2021

清代唐宋诗之争中的“穷而后工”〔*〕

唐芸芸
(重庆师范大学　文学院,重庆　401331)

〔**摘　要**〕“穷而后工”是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,其发展过程充满了争议。随着清人对诗人主体讨论的深化,人们开始关注个人体验与诗歌价值的深层关联。个人体验与盛世情怀产生矛盾的清初诗人,尝试用“诗可以怨”平衡“穷而后工”与“温柔敦厚”;沈德潜提出“心中有主,境不为累”,以超越“穷而后工”;袁枚则指明诗歌是处穷之人最重要的抒怀方式,更接近欧阳修的原义。

〔**关键词**〕清代唐宋诗之争;穷而后工;宋琬;沈德潜;袁枚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21.12.012

明末清初,人们有感于明代诗学空疏所带来的厄运,兴起了持续的关于诗歌生命价值的讨论,主要包括“诗言志”,以及与“志”息息相关的“性情”和“诗如其人”。这些都不是新鲜的概念,清人对之进行强调、细化且重新整合,表明了对传统诗学复归的坚定态度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这些产生于《诗经》时代的概念或命题,都不是口号,而是拯救明人亡天下的良药。既与“天下”相关,自然考虑的是诗歌的功用。我们知道,汉人对“志”的规约是非常明确的,“发乎情止乎礼义”中的“礼义”,是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款。而清人不可能再回到这样一种士人生活与政治紧密相关的生态中,所以对“志”的规约,主要分为向外和向内,即对政治体制的依附和对自身道德的修炼。无论是在创作抑或批评上,前者都很容易达成。但诗人自身的道德,却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语境中,因为既有内在化的修养,也有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,二者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关系。清人在这方面讨论的重点命题之一,便是诗人的人生处境与诗歌创作及其价值的关系。这就是穷而后工。

一、穷而后工的价值及诗学困境

穷而后工,出自于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评价,比较常见的材料是下面一段:[1]

>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,夫岂然哉?盖世所传诗者,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,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,外见虫鱼、草木、风云、鸟兽之状类,往往探其奇怪;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,其兴于

作者简介:唐芸芸,文学博士,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。
〔*〕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与逻辑进程”(17XZW019)的阶段性成果。

怨刺,以道羁臣、寡妇之所叹,而写人情之难言。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,殆穷者而后工也。予友梅圣俞,少以荫补为吏,累举进士,辄抑于有司,困于州县凡十余年,年今五十,犹从辟书,为人之佐,郁其所畜,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,幼习于诗,自为童子,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,学乎六经仁义之说。其为文章,简古纯粹,不求苟说于世,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,语诗者必求之圣俞,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,乐于诗而发之。故其平生所作,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,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:"二百年无此作矣!"虽知之深,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,作为雅颂,以歌咏大宋之功德,荐之清庙,而追商周鲁《颂》之作者,岂不伟欤!奈何使其老不得志,而为穷者之诗,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之言。世徒喜其工,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,可不惜哉![2]

"诗人少达而多穷",指出了士人的真实生态,也是欧阳修对梅尧臣经历的唏嘘之处。"穷者之诗,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之言","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,作为雅颂,以歌咏大宋之功德,荐之清庙,而追商周鲁《颂》之作者",欧阳修用一个"伟"字形容。一个可作《颂》的诗人,徒于虫鱼、草木、风云、鸟兽之工,这就是"穷者"的创作状态。显然,欧阳修并没有否认梅尧臣处"达"作诗会逊于"穷"时,穷而后工甚至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价值判断,他的这个命题其实是在对梅尧臣诗歌状态的一种描述。所以,"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"的"穷",指的正是梅尧臣工于诗的能力不得施用于《颂》制,并没有明确指向"世之穷"。对虫鱼、草木、风云、鸟兽之"奇"与"怪"的探究,可能是"工"的重要因素,也是诗人体验触角伸发的表征。但虫鱼物类对"人情之难言"的引譬连类,与"兴于怨刺"的风人之旨,并不矛盾。

所以如果用严格意义上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来评价杜诗,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,随着穷而后工的概念在清代的发展,人们在以其对杜诗价值进行定位时却出现了问题。

首先,杜诗在清代主流诗坛的地位与六经并立,但其处于盛唐与中唐之交,经历安史之乱,是为"变风"时代。杜甫"处穷"是事实,其诗之"工"也令人信服,但时代的时运际会已经定下了诗作的基调,所以在时运与诗运的系统里,杜诗只能是低于正风价值的"变风"。由于杜诗的经典化地位,如果过分强调杜甫的处境为"穷",则无疑将人们的视线更多引向杜甫所处的"变风"时代。

其次,穷而后工的评价,显然更多地将杜诗之"工"归功于诗人的处境,而忽视了诗人主体的创作能力:即诗作可否达到"工",诗人本身的价值在处境面前似乎变得可有可无。所以会迎来诸如"处穷写得好,难道处于尧舜之世,就写不好吗"之类的反诘。这是清人在处理杜诗与穷而后工矛盾时经常提出的疑惑。

再次,又由于人们对穷而后工的误解,将之与"穷苦之言"直接等同,即直接将"穷"从一种外在的处境,变成了书写的偏向,导致对杜甫的诗歌评价产生了严重偏离。如汪琬对杜甫的误解:"今之学诗者每专主唐之杜氏,于是遂以激切为上,以拙直为壮,以指斥时事为爱君忧国",被翁方纲批评:"激切拙直指斥时事为古,如汪先生之所言者,此乃正高谈貌古者之弊也,而可以为杜病乎?"[3]

清人以穷而后工评价杜甫,显然已经与欧阳修评价梅尧臣相去较远。究其原因,是清人将这个命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:除了包含诗人处境与诗歌价值的关系外,诗人处境又指涉了"诗言志"即性情的内涵和规范,以及时运与诗运关系,而诗歌价值也与温柔敦厚有牵连。所以穷而后工成为一个关联多个诗学讨论面的复杂问题。

处于艰难处境中的人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自己的感受力和表现力,无论持何种态度,都体现了人们对人生境遇的体验与思考,这对文学创作是有利的。周裕锴《宋代诗学通论》强调:

穷而后工的“穷”,不是经济状况,而是一种政治处境,或社会阅历的不顺达。所以,诗歌的情感内涵,是“忧思感愤”,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,而不是穷酸的牢骚不平。[4]就是说:并不是发牢骚,甚至不一定写“穷”,更不是所谓的“穷苦之言易好”。“穷”对诗人的意义,不在于能唤起哀怨的感情,而是能加深人生的体验。所以从创作的角度来说,穷而后工鼓励诗人,特别是处穷诗人,不要被淹没在对境遇的牢骚中,而是用诗歌将身处其中的感受(但不一定是对“穷”的直接感受)表达出来,这种表达往往可以达到“工”的程度;而从批评的角度来说,诗歌史上的经典,大多由处于逆境的诗人完成,这是他们的生命价值在诗歌上的体现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成为“经典”,而诗人的生命也由此获得延续。

穷而后工确实激励了仍然挣扎于各种艰难状态里的诗人,很有些“关上一扇门,打开一扇窗”的意味。这是对于创作主体而言的,也是与“发愤抒情”“发愤著书”的承接部分。我们都喜欢有故事的古人,顺达一生平淡无事迹会被认为其情感不曲折或者没有深度等等。但作为生活在其中的古人,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?创作是人生的再体验,他们是否愿意将这种苦难在诗文中还原且强烈凸显?是否愿意将这种苦难传播开去,甚至成为自己的符号?是否愿意把自身处境和文学成就联系起来?是否承受处境带来的同情超越作品的成就?

而当“工”的价值判断赫然在列,穷而后工这个命题,实则重心已经转移到诗歌批评的领域。无论“工”的具体内涵指向的仅仅是字句音节,还是与字句音节相契合的诗作的整体价值,都无法掩盖这是个褒义性陈述的事实。也正是确立了“工”的价值,才更明确地将诗人的某类处境与诗歌的好坏联系起来,无论这个联系是否总是成立,在什么程度上成立,都体现了人们对诗歌所寄予的体现生命价值的厚望。诗歌的生命价值一直以来是以“厚人伦,美教化”为最上的,但其确立之初的政治意味太浓厚,便在一定程度上把生命价值的范围凝练缩小了。穷而后工作为对历代士人“多处穷而少达”生存状态的概括陈述,结合“知人论世”的方法,便更能追绎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,诗歌的生命价值获得了更广泛的体现,使得在时间上没有交集的人们也可以产生共鸣,无论古今。

但是,在穷而后工概念运用的过程中,人们往往偏向于对“穷”的追索,用“知人论世”的方式,将“穷”字用诗人的生平资料堆砌饱满,并将处境的复杂曲折,直接与诗作之“工”联系起来。这是穷而后工在诗歌批评的运用上最常见的套路。

诗人所处之境地,对诗人的创作体验和表述,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,但是如果直接与“工”联系,则就过于凸显诗人所处境地的作用。在经历了明代对诗歌的细化讨论,清初对明诗学持续反思的过程后,人们早已认识到,“好诗”不是一两个因素可以决定的,既不可能仅仅是诗歌内部体制,也不仅仅是诗人的处境及体验,而是个综合的复杂过程。侯方域指出,欧阳修穷而后工是有所寄寓感慨的,非为定论。所以存在着“虽穷亦不工,能工者不必穷亦工”的情况,一生顺达的宋荦便是绝好的例子。“宋子之不必穷而工者”,“今日幸见太平”,而宋荦之诗可追鲁颂,“宋子之诗之工固终不必有藉于穷,然而其不穷者岂非各有其时哉”。[5]在为顺达的宋荦诗歌作序时,侯方域竟然大谈穷而后工的理论,反映了这个概念影响之大。易代诗人肯定都经历过“处穷”,后来可能进入“太平”时期,但这只是外在环境,而不一定是个人处境。侯方域与当时很多人一样,将外在环境与个人处境合一,而命运多舛的宋琬则将二者明确分开,这里便有一个体验深化的过程。

而穷而后工与“发愤抒情”“发愤著书”的更大区别在于,“发愤”强调的是内心体验,但“穷”并没有清楚地指出是内心体验还是个人处境抑或是外部环境。其实穷而后工应该更多指向的是诗人主体对处境的处理能力。穷而后工是诗

人生命价值在诗歌中的体现,这本应是对创作主体的重视。其合理性恰恰存在于诗人的体验,即处于逆境中,会激发诗人的体验触角,对于本来就比常人敏感的诗人来说,他的视野会更广,思考会更深,如此便扩大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。也会在表现方式上有更多可能。实则是揭示了诗人主体在诗歌成“工”路上的重要意义。而诗人所处的时代,对于诗人本身来说是不可易的,可易和可控的,恰恰是诗人主体的内心体验和表达。如果诗人的感受力处于恒稳状态,那么也无法否认他会在非“穷”之世有深刻的体悟,并以其非凡的表现力,创作出可称为“工”的诗作。

所以这个命题的复杂之处在于:“穷”还存在着外部环境之穷、个人处境之穷和个人体验之穷的区别。传统诗学中规定的时运与诗运的关系,约束着诗人对世道人心的真实呈现,虽然最大程度明确了诗歌的价值功用,但实则是在“集体”创作之下的产物,缺乏对“人”本身的关注。诗歌虽然是言志的,但所言之“志”是为与社会政治要求完全切合之志。这是一个群体行为,又通过“诗可以群”而达到群体效应,形成一个内心价值导向和外在行为准则的闭环。但当诗歌逐渐倾向于个体情感的抒发,便会出现个体体验与外部环境的离合。个人体验如若与外部社会政治的要求出现反差,那么,作为言志抒情之诗当如何表现?这种反差是否会动摇诗歌的社会功能呢?对个人处境的书写还是有历史可溯的,早在《楚辞》时代便有的“发愤抒情”,对个人境遇的困顿有明确说明:屈原的困顿,与外部环境之“穷”相合;但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,按照世运来说,则完全属于个人体验。穷而后工这个命题之所以仍然受人青睐,是因为将世运与个人体验的“离合”转向了诗歌价值高下的评价。而个人处境与外部环境也存在完全相合,或者有别的情况。于是,处境便与诗歌价值高低形成了绝对关系。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关系里,只是呈现了个人处境之“穷”,这是一个可考察的客观事实,而个人体验、个人处境、外部环境,每一个因素都有“穷”与“达”两种情况。于是便可能出现以下数对关系:

外部环境(穷)—个人处境(穷)—个人体验(穷)
外部环境(穷)—个人处境(穷)—个人体验(达)
外部环境(穷)—个人处境(达)—个人体验(穷)
外部环境(穷)—个人处境(达)—个人体验(达)
外部环境(达)—个人处境(穷)—个人体验(穷)
外部环境(达)—个人处境(穷)—个人体验(达)
外部环境(达)—个人处境(达)—个人体验(穷)
外部环境(达)—个人处境(达)—个人体验(达)

人生体验,说到底追求的是一种平衡。这个平衡指向心理、人际关系、信仰等等。即使暂时呈现为对平衡的打破,那也是为了追求了下一个平衡。所以在对穷而后工的讨论中,会出现个人处境与外部环境不一定完全相合,个人体验与个人处境也不一定穷达一致,更不用说个人体验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逆的可能。那么,穷而后工这个命题本身,便存有三个根本困境:

第一,穷而后工与时运诗运关系评价体系的矛盾。

穷而后工既然强调环境,那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与时代的关联。乱世、亡国的大环境,诗人自然是处穷无疑。在传统诗学观念中,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时运与诗运关系,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,自是变风。变风虽然也不能说不工,但终究价值低于“正风”。作为对个体感受和创作的激励,肯定抵不过对群体政治理想的文学期待。所以,“工”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程度,难以定论。

而另一方面,盛世中处穷也是常见,这个处境中的诗人,其诗之工是否归功于“处穷”?那么个人处境之穷与盛世之矛盾,该如何解决?这个问题在清初尤其突出。

第二,穷而后工与“诗可以怨”复杂的离即关系。

“诗可以怨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诗歌对主体情绪的表达功能,但必须是“怨而不怒”者。那么,穷而后工,无论是诗人的个人处境、个人体验还是外部环境,诗人主体对“穷”的表达,究竟

需要限制在什么程度,才被称为“工”?一旦诗歌变成了诗人“境遇”的写照,诗歌评价就会产生很多问题,如激切之语,如铺写,就会有或内容上、或风格上的误会,也容易被置换为“穷苦之言易好”,即审美趣味上的呈现。如侯方域为宋荦作序时提出:穷而后工的价值判断,使得很多人无病呻吟,特别是富贵者作穷愁语,[6]这显然与温柔敦厚相悖。但是富贵者作穷愁语其实是错误理解了穷而后工,只不过是用诗歌表现“穷”状,发“穷苦之言”而已。穷而后工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,误解一直存在,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命题自身的价值。

第三,“工”的价值难以定位。

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,实则是建立在“写人情之难言”基础上进行的判断,即处穷之诗人在对自身处境的感触和表达上,特别是涉及到难言之情状,会更具观察力,也有发言权。当时,“工”是一个大家约定用来判断诗歌具备某种价值的语汇,但绝对不是最高一级的,或唯一的对“好诗”的评价。而清人由于对“好诗”的具体标准,如“高古者格,宛亮者调”之类一一摒弃,致使“工”论诗的重要性逐渐上升。以不指向任何确定性风格和表现方式的“工”,作为诗歌较高甚至最高一级的判语,似乎是整饬诗坛较有效的途径之一,突出者如叶燮、袁枚。所以,当清人在讨论穷而后工的时候,他们的言论也可能同时暗含着对诗歌审美价值最高一级评价的问题。

清人在大规模厘清传统诗学概念与诗歌史的过程中,廓清诗人处境与诗歌价值的关系,也是势在必行。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,显然是伴着对指涉唐宋诗之争的其他问题,尤其是诗人主体问题与正变观念的解决来进行的。而清人在处理诗学观念与诗歌史事实有出入甚至是矛盾的问题时,往往有两种思路:第一种是对诗歌史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,使其被规范入诗学观念中;第二种则是将诗学观念进行重新阐释,使其符合诗歌史发展事实。第二种思路,其实包括了内涵的重新阐释,和价值的重新判定。内涵的重新阐释即昭示了清人对传统观念的修正勇气。而价值的重定也并不一定建立在内涵重释的基础上,即可以认同核心诗学概念的传统内涵,但是对其在整个诗学体系中的价值进行重新判定。这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而“穷而后工”则更偏向于对概念本身的讨论,包括扩容、修正和部分意义消解。

二、清初诗人:温柔敦厚下穷而后工的适用性

时运与诗运相合的观念,在重建传统诗学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,所以钱谦益会重提并以诗选进行传播。但是在此阶段的人们,一方面坚信时运与诗运的关系,另一方面又由于个人处境与社会环境出现了分离,所以对时运的价值判断开始出现松动,人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,并尝试解决。

典型如宋琬,一生坎坷,诗歌颇有成就,被时人认为是穷而后工的最佳范例。《安雅堂文集》金之俊序曰:“其思深,其识宏,其虑远,其情长,其气清以厚,其调隽以永,其格严以老,其言确以质,殆有如怀沙远游、屈子悲愤之所感乎?何其沉挚而凄婉也。有如历衡湘越龙门,周游历览,司马子长仰欝太息之所作乎?何其激昂而雄肆也。抑亦若柳州、眉山,流离困顿,备尝险阻之所寄托,而发为文词乎?何其峻洁而旷达也。”认为其一生之坎坷,是触发性情学问处。后面便专引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,寻找历史上的知音:“欧阳永叔所云:‘愈穷则愈工,非诗文能穷人,殆穷者而后工也。’其玉叔之谓欤?然穷极则通,玉叔之穷有止境,而诗文无止境也。”[7]

而尤侗序曰:“欧阳子谓诗能穷人,世之不工诗而穷者何限?其显当世成大名者又非诗之所能穷也。”[8]这是误读了欧阳修的话,将穷而后工变成了“诗能穷人”。但其可取之处在于,强调了诗人主体的能动性:不为诗所限,不因过分重复书写穷顿而一直陷于这种情绪之中。如何处理穷顿情绪,主动权应该是掌握在诗人手中。这也是对盛世情怀与个人处境矛盾的一种处理方式。

因为盛世情怀的原因,人们非常警惕对坎坷的表现。个人处境艰难的宋琬,可能更多能体会温柔敦厚的困境。他用传统诗学中的另一个命题“诗可以怨”,来稀释温柔敦厚对穷顿情绪的限制。在《徐伯调岁星堂集序》中,宋琬首先明确当时是昌明之世。[9]那么,“穷”就只限制于个体处境,但这种情绪不能被“昌明”所同化。“人之性情必有所寄。无以寄之,则繁伤侘傺,蹇产于邑,如水之失防也,泛滥溃决,颓放而不能自止。”[10]《王雪洲诗序》中说:“昔者屈平既放,忧愁幽思,而作《离骚》。司马子长断之曰:‘《离骚》之作,盖自怨生也。’怨也者,忠孝之至,而非愤恚怼怒之谓也。”[11]一直被作为“发愤抒情”典范的屈原,和“发愤著书”的司马迁,其著作都不是直陈的,而是用香草美人,或化作古人的生命写照以自况,均在温柔敦厚范围内。在这个程度上,“诗可以怨”是可以接受的。

这与宋琬对于杜甫的评价相表里。《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跋》曰:“为命可谓穷矣,顾其诗乃逾益工,格亦逾益变,近所传《秦州杂诗》《同谷七歌》数十篇,忧旨悯乱,感物怀君,怨不涉悱,哀不伤激。殆泯泯乎《小雅》《离骚》之遗矣。”[12]他承认杜甫处“穷”,但诗歌不戾乎风雅,而且是离骚之遗。“怨不涉悱,哀不伤激”,即必须符合风雅的情况下,穷而后工才能成立。但这里强调的是《小雅》《离骚》之遗,而不是《国风》之遗,与主流的温柔敦厚还是有所区别。

那么,如何限制怨怼的表达呢?宋琬特别强调不可以“有意为奇”:“人不奇,恶能诗!有意为之,弗可也。诗不奇,恶能传!有意为之,弗可也。人有意而为奇,则且为颠、为放、为回惑、为披猖。诗有意而为奇,则且为诡、为僻、为诘曲、为支离。此殆有性情焉,非可强而致之也。”[13]这是对创作主体的要求,“奇”应该是超越一般人的敏感。有意为之,则是为超越一般的表现方式,而不是敏感。汪琬也说:不能从奇处求奇,杜甫能自守,所以老而弥健。[14]这正是温柔敦厚下穷而后工的适用性。而施闰章对杜甫的五古颇有微词:“《潼关吏》《新安》《石壕》《新婚》《垂老》《无家》等篇,妙在痛快,亦伤太尽。”[15]“痛快”即是表达了“怨”,但是“太尽”,已经对温柔敦厚的要求有所逾越。处穷需要节制表达,必须符合温柔敦厚。后人对宋琬的评价,也说明他做到了这一点:“天才俊上,跨越众人,中岁以非辜系狱,故时多悲愤激宕之音。而溯厥指归,仍不盩于中正,此诗中之变雅也。”[16]

三、“心中有主,境不为累”:沈德潜对穷而后工的超越

叶燮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穷而后工,但是对诗歌求“自鸣而非他鸣”[17]的主张,正彰显了诗人主体“独立不惧”的形象。沈德潜便延续此思路进一步探索。他试图恢复诗乐关系,同样秉持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,“清和广大者为正,志微噍杀者为变”[18]的表述,似乎指向“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”的时运与诗运关系。但显然,沈德潜并不认为处穷的杜甫所作为变声。而他解决“处穷”与温柔敦厚的关系,是从“心中有主”入手的。他早年也曾“处穷”:“君今饱朝餐,曷以知我饥。倘能问治田,相与耕东菑。”[19]六十六岁才中进士的经历,也使得其对穷达之转换有更深的体会。对于逆境于人的体验的深化作用,沈德潜非常认同。他同意韩愈、苏轼在经历困境后,“诗格较胜于前”,所以“大抵遭放逐、处逆境,有足以激发其性情,而使之怪伟特绝,纵欲自掩其芒角,而不能者也”。[20]但沈德潜并不是穷而后工的支持者,而是要求在“穷”之后有一个“不惑”的追求:“穷益甚,诗格益高,其殆穷而不惑者与?”[21]“穷而不惑”才能带来“诗格益高”,即“工”的结果。他在《家光禄敬亭诗序》中提出了核心观点:

> 从来人之穷达,每因乎所处之境:当其穷即溺于穷,而不敢以行义达道为己任;当其达则又溺于达,而不能复处乎箪瓢陋巷楮冠梨杖之常,故措之于事,见之于言,戚戚乎不自

得也,皇皇乎惟恐失也。此无他,心无主而境累之也。求其处穷达而超然于穷达外者,为家光禄敬亭先生。[22]

逆境确实让人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。但是,处穷也必须是心怀天下,而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的生计,超乎“穷”才能自得。“志微噍杀”的“变声”,原因不在于“处于穷境”,而在于“心中无主”,来源于诗人主体的感知。所以“志微噍杀”与时代并没有直接的关联,并不是处于乱世或亡国之时,诗歌就会“志微噍杀”。“不自得”与“恐失”,是“心中无主”的重要方面。不但“穷”如此,“达”亦如此:

人必可以达,可以穷,可以处顺,可以出逆,可以展经术于当时,可以老一身于林壑,则其出也,为家国有赖之人;其归也,守吾道于退藏,以为儒行之楷式,此济时乐天之所以两得也。[23]

沈德潜将人生状态进行了全面概括,承认了人生处境的多样化,可以处穷,也有处达,还有穷达之间的转换。对于“出”与“归”,即“达”与“穷”的归求,便是“儒行之楷式”。自然无论“处穷”,还是“处达”,都符合温柔敦厚。若心中无主,个人的内心体验便是以“境”为依据。处境之好坏,便造成心境之穷达体验。那么,人就被外物即“境”所役。这种无“主”的内心体验,并不值得表达在诗歌中。因为宜其发言为诗者,须“以道为归”。[24]杜甫虽然处于乱世,但其心中之主是一以贯之的,这正是难得的“穷而不惑”:

谁续诗三百?遥遥见此人。乱离身遍历,忠爱性弥真。吐属经千鍊,风华寓五伦。后来问途者,舍是恐迷津。[25]

因此,沈德潜并不欣赏诗歌情感过分湮滞在一己之伤怀中,他批评骆宾王《帝京篇》“伤一己之湮滞,此非诗之正声也”,[26]这便是“心中无主”。他认为陆游同写病事的《春残》“庸医司性命,俗子议文章”句,不如《省事》“心安闲梦少,病去俗医疏”句有味,[27]显然《省事》中所体现的,正是在同样的境遇中,对生存状态的超脱,这便是“心中有主”。

沈德潜由此表达了对人生处“穷”的通达见解:“天能穷我以遇合,不能穷我以千古。”[28]这是站在时间轴上看待自己的价值。与古人为友,“我”的世界就会很大。本来穷而后工的价值之一,便是延展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精神依托,即与处穷之古人产生共鸣。但这个共鸣,只限于“穷”,无论是处境之穷还是体验之穷。如此,诗歌的生命价值其实被削减了。沈德潜认为,我们与古人为友,与古人的惺惺相惜,本不在于共同处“穷”,不在于“境”之雷同,而在于心中之“主”的胶合。

所以,学古人之诗,当有古人之性情,今人是在性情上与古人相通。以学陶渊明为例:“晋人尚清言,而陶公多忧勤语,多安分乐天语。倘游孔门,不在元宪、季次下也。后之拟陶和陶者,无陶公性情,而徒求之音响肤末,毋乃有近而弥远者乎?”而李酣芸的和陶诗“虽不皆似陶,而兴趣所存,远而转近,夫亦足以相乐已。昔苏子瞻谪儋耳,饱吃惠州饭,细和渊明诗。子由序之,谓其精深华妙,不见老人衰惫气。然忧患余生,勉强寻乐,犹脱网小鸟,饮啄虽恬,惊心常在也。酣芸之履境坦夷,始终酣适,殆有超乎人而相遇以天者乎?他日倘尽和陶公诗,应有得子瞻所未尽得者”。[29]这“遇以天者”,便是所谓的“心中有主”。处于顺境的李酣芸能与陶诗相近,正在于“兴趣所存”,即心中之主的古今相通,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过尚有“小鸟脱网状”的苏轼和陶诗。

沈德潜对“处穷”的深刻剖析,解决了如何处“穷”,实际上也同时解决了如何表现“穷”。因为无论境遇是穷是达,只要心中有主,以道为归,诗歌所体现的就应该是温柔敦厚。关于“心中有主”的言论,虽然脱不开与政治的关系,但是,他将之上升到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,不能说其不深刻。沈德潜强调了人生体验的深刻性,更注重人生体验与诗歌价值的关联,解决了杜甫身上的温柔敦厚与穷而后工的问题。温柔敦厚成为人格修养的理想状态。结合“清和广大者为

正,志微噍杀者为变”,所以沈德潜实际上是将“变风”的外部环境因素,转移到了内心体验上来,追求的仍然是“归于道”的和平之旨,与“声音之道,与政通”的内核一致。在沈德潜看来,归于正的主体体验具有超越性,可以超越格调的限定,便也可以超越外在环境的限定。这个关键的思考体现了沈德潜对主体强大力量的极大信心,也说明沈德潜对一直以来“蕴藉”所独具的讽谏优势的消解。

四、袁枚:取消“穷而后工”价值的唯一性

清代穷而后工问题的解决,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:第一,“穷”与“工”是否有对应关系;第二,“穷”是否可以在诗歌中展现;第三,诗人主体应该怎样感受“穷”。三者既非并列关系也非递进关系,而是交织进行的。第一个问题是一直贯穿讨论的,而且涉及到对“工”的认知;第二个问题主要是表现方式,与温柔敦厚有关,与“蕴藉”和“发露”的讨论有关;第三个问题,是关系到诗人主体精神的问题,看似与穷而后工的核心关系最远,但实则却是解决穷而后工困境最基础的认识。而袁枚却依循他一贯的“解构”思路,冷静地看待这个讨论热点。

因为袁枚是以“工拙”论诗的,所以对穷而后工的命题也比较敏感。他首先认为这是衰世之言:“古人若唐、虞之皋、夔,成、周之周、召,何尝不以高华篇什,传播千秋?然而彼皆扬拜于殿廷,未有流传于草野者。”[30]即指出这个论题并不具有决定诗作之“工”的绝对意义:

> 古之为诗文者,往往谓穷而后工,非也。盖穷者无所工,而仅以之自见;显者不以此自见,而亦未必其不工也。今夫《典》《谟》《雅》《颂》,文章之至工也。其人皆身至王侯将相,或天子之叔父,乃能发韵抒藻,张皇万古;下至韩、范、司马,亦各有集稿数十卷,可诵可传。然称之者卒不俪之杨、刘、班、马间。是其人不藉文以传,而文卒莫不传也。[31]

即穷者没有别的宣泄方式,所以只能以诗见志;而显达之人,不(仅仅)以诗见志,却未必写得不工。也并不是说“工”的诗都因“穷”而写,处“穷”之诗也不一定为“工”。“穷”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,写诗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,但二者都不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全部。就此,袁枚取消了穷而后工在诗歌与人生体验及人生价值的关联性解释。袁枚尽量去除后人附加在穷而后工上的种种意义,将之视为诗人创作状态的一种,相比之下更接近欧阳修的原义。

虽然沈德潜以“心中有主,不为境所累”超越了穷而后工,但毕竟他是站在“宗旨”即道德理想的角度而言的,而袁枚虽然将人生体验扩大了,但其认为穷者只能作诗,恰似一个“处穷”者的自嘲。

五、结　语

事实上,诗人对体验获得的多少和深浅,是无法直接在穷、达二者身上分出高下的。因为极有可能,“我生活幸福,但也尝到了人间最深刻的悲恸”。幸福指的是一种自足、自适,而痛苦便是人情之难言。沈德潜在解决穷而后工的问题时提出了“心中有主,境不为累”,虽然我们当下的“心中之主”与沈德潜的并不相同,但这个思路却对于我们处理人生境遇有很大启发。“心中之主”,已经成为主宰我们生命体验的核心力量。只要心中有“主”,人生的一切体验都是依“主”而行,无论穷达。所以,“达”并不值得炫耀,“穷”也不需要悲哀,因为“心中之主”是坚定不移、独立不惧的。如此,人而为人,才是为“独立”。这并不是逃脱的话语,而是终极追求。所谓惬意人生,独得于此。

注释:

〔1〕学界对穷而后工的讨论有一个显著特点,即非常注重这个概念的渊源及在古代的流变。古人对这个概念或是赞许发扬,可以举出大量例子,或者生成如“词穷而后工”“文穷而后工”之类的概念,当然还有更多反对者和修正者。并有学者指出欧阳修以穷而后工论梅尧臣诗,是出于北宋党争的具体背景,如巩本栋:《“诗穷而后工”的历史考察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

学版)》2008 年第 4 期。

〔2〕〔宋〕欧阳修:《梅圣俞诗集序》,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《全宋文》第 17 册,卷 716,成都:巴蜀书社,1991 年,第 425 – 426 页。

〔3〕〔清〕翁方纲:《重刻海日堂诗集序》,载石洲草堂校刊程可则著、翁方纲评点:《海日堂诗集》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石洲草堂刊本。

〔4〕周裕锴:《宋代诗学通论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 年,第 103 – 109 页。

〔5〕〔6〕〔清〕宋荦:《古竹圃稿序》侯方域序,《西陂类稿·旧刻诗词及新编文稿各序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135 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 年,第 2 页(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以下出版社、年代略,只标注册数、页码)。

〔7〕〔清〕宋琬:《安雅堂文集》金之俊序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593 – 595 页。

〔8〕〔清〕宋琬:《重刻安雅堂集》尤侗序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673 页。

〔9〕〔清〕宋琬:《徐伯调岁星堂集序》,《安雅堂文集》卷 1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610 页。

〔10〕〔清〕宋琬:《胥永公诗序》,《安雅堂文集》卷 1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611 页。

〔11〕〔清〕宋琬:《王雪洲诗序》,《安雅堂文集》卷 1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618 页。

〔12〕〔清〕宋琬:《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跋》,《重刻安雅堂文集》卷 2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738 页。

〔13〕〔清〕宋琬:《竹巢诗序》,《重刻安雅堂文集》卷 1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4 册,第 691 页。

〔14〕〔清〕汪琬:《绮里诗选序》,《钝翁类稿》卷 28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94 册,第 215 – 216 页。

〔15〕〔清〕施闰章:《愚山先生别集》卷 2《蠖斋诗话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67 册,第 627 页。

〔16〕〔18〕〔清〕沈德潜选:《清诗别裁集》卷 2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,2013 年,第 65、55 页。

〔17〕〔清〕叶燮:《友人诗集序》,《已畦集》卷 8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104 册,第 408 – 409 页。

〔19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答施贯斋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2 册《竹啸轩诗钞》卷 8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 年,第 790 页。

〔20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姜自芸太史诗序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3 册《归愚文钞》卷 12,第 1324 – 1325 页。

〔21〕〔28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〈苇花居诗集〉序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4 册《辑佚·佚文》,第 1769 – 1770 页。

〔22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家光禄敬亭诗序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3 册《归愚文钞》卷 13,第 1338 – 1339 页。

〔23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送李鹿山大中丞归里序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3 册《归愚文钞》卷 14,第 1366 页。

〔24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敬亭诗草序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4 册《辑佚·佚文》,第 2001 – 2002 页。

〔25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读杜诗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 2 册《沈归愚诗文稿·近草》,第 1081 页。

〔26〕〔清〕沈德潜选:《唐诗别裁集》卷 5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 年,第 150 页。

〔27〕〔清〕沈德潜编:《宋金三家诗选·陆放翁诗选》卷下,济南:齐鲁书社,1983 年,第 49 – 50 页。

〔29〕〔清〕沈德潜:《李酣芸〈移居和陶诗〉序》,沈德潜著、潘务正等校点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第四册《归愚文续》卷 7,第 1822 页。

〔30〕〔清〕袁枚:《答云坡大司寇》,袁枚著、王英志编:《袁枚全集新编》第 8 册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四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8 年,第 81 – 82 页。

〔31〕〔清〕袁枚:《德山堂稿序》,袁枚著、王英志编:《袁枚全集新编》第 8 册《双柳轩文集》,第 21 – 22 页。

〔责任编辑:李本红〕